

## 沟通与引导<sup>〔\*〕</sup> ——王韬新闻理论初探

○ 王立群<sup>1</sup>, 余三定<sup>2</sup>

- (1. 北京科技大学 文法学院, 北京 100083;  
2. 湖南理工学院 中文系, 湖南 岳阳 414006)

〔摘要〕作为“中国新闻之父”, 王韬不仅创办了近代中国人独立创办的第一份日报《循环日报》, 而且系统阐释了新闻理论。他认为报纸的基本功能主要有三: 一是让中国与世界相互沟通了解; 二是沟通统治者与普通民众; 三是引导正确的舆论。他倡导在中国发展新闻事业, 对中国新闻事业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

〔关键词〕王韬; 《循环日报》; 新闻理论; 变法自强

在 19 世纪资产阶级思想改良运动中, 王韬创办了《循环日报》, 实践了自己的新闻理论, 是第一个利用报刊这种现代传媒对社会问题发表看法、宣传资产阶级改革的思想家。他所提出的学习西方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发展民族工业、实行“君主立宪”等主张, 对资产阶级改革思想的传播和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发展起到很大推动作用。他所提出的新闻理论, 开创中国新闻理论之先河, 在其后梁启超、郑观应等人所提出的报刊理论中都可以看到受其新闻思想的影响。

### 一、从邸报到日报: 中国近代报业的兴起

中国的新闻事业起步比较晚, 邸报是最早出版的报纸“雏形”。邸报最早出

---

作者简介: 王立群(1971—), 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 文学博士, 主要从事近现代中外文学与文化关系研究; 余三定(1956—), 湖南理工学院中文系教授、《云梦学刊》主编, 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学和当代学术史。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形成——以墨海书馆为中心”(项目编号 10YJJCZH154)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现在唐朝,由各地派驻都城的邸务留后使负责传发,故称“邸报”,又名“邸钞”、“阁钞”、“朝报”或者“京报”。其后,宋、元、明、清几个封建王朝都沿袭了这一编辑发行邸报的方式。邸报刊登的主要内容是皇帝的诏书和封建王朝颁布的政令、政府官吏的升迁与任免的通告、各级官僚的奏疏和皇帝的朱批等等,不刊登一般的社会新闻,也不对重大社会事件发表评论。可以说邸报是封建王朝的政府机关报,是完全由政府控制、以发布政令为主的内部参考消息,其发行所针对的对象是各级政府官吏,平民百姓是没有机会看到邸报的。邸报的消息传递是单向的,即由最高政府下达到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官员需要向中央政府表明他们的意见和看法,则只能通过上奏折的方式进献。应该说,邸报还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报纸,它更接近于政府发布的内部通告。作为报纸的雏形,邸报还处于报纸发展的最初级阶段。

鸦片战争前后,一批西方传教士相继来到中国,以创办报纸作为传教的辅助手段,近代意义上的报纸由此传入中国。西人所创办的报纸根据其使用语言和发行对象的不同,可以分为中文报刊和外文报刊两大类。

外文报刊针对的对象是在中国的或者西方各国的西方人,主要向西方各国介绍中国的自然和人文情况,为本国政府采取相应的对华政策出谋划策,制造舆论。应该说,西文报纸对于西方国家的对华政策产生了很大影响,某些报纸甚至曾充当本国政府制定对华侵略政策的帮凶。因为当时精通外文的中国人屈指可数,因此,《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 1832年5月创办于广州)、《北华捷报》(North - China Herald, 1850年8月3日创办于上海)等英文报纸虽然是在中国国内创办的,但是对国人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对中国近代新闻业的发展也没有产生相应的促进作用。

真正影响国内新闻业发展的是西方人创办的、以中国读者为阅读对象的中文报纸。为了实行对中国的文化侵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上海、天津、北京、广州等大中城市相继创办了一大批以中国人为读者的报纸,一方面宣传国家的对华政策,一方面引导中国人对西方国家的看法。这些报纸大部分是由教会和传教士创办的,有的是由洋行、洋商为了赢利的目的创办的,前者如1868年9月5日创办的周报《中国教会新报》(1874年9月5日改名为《万国公报》),后者如1861年11月由字林洋行在中国境内创办的第一份中文报纸《上海新报》,等等。其中,1872年4月30日英国商人美查(Ernest Major)、伍华德(L. Woodward)、普莱亚(W. B. Pryer)和瓦其洛(J. Wachillop)等四人联合创办的《申报》,是上海历史最久、影响最大的中文日报。初创时为隔日出版,四个月后又改为日报,除星期天外每日出版。《申报》采用活字印刷,开始所载多诗文之类,间及中外近事,也如传奇小说般信笔点缀,对此不甚重视。为了吸引读者,报纸上开始刊登一些社会新闻和西学知识,原来作为点缀的新闻报道内容趋于翔实,这反而促进了报纸的发展,销售量大增。《申报》创刊时销售量只有600份,到1876年迅速增加到2000份。这些报纸的创办形式与发行方式对其后中国新闻业的产生起到了重

要的启迪、示范作用。

最早提出在中国设立报馆、创办报纸的中国人是洪仁玕。作为太平天国干王,咸丰九年(1859年)他曾经在给天王洪秀全提出的改革方略《资政新篇》中提出在中国设立报馆(洪仁玕称之为“新闻馆”)的建议。<sup>[1]</sup>洪仁玕认为,通过报纸可以了解人民的意愿,可以将它作为“沟通上下”的工具来使用;另外通过报纸还可以了解各地物价行情,促进工商业的发展。他认为太平天国中央政府应该在每一个省会都设立独立于其他的官员之外的、有职无权的新闻官,搜集有价值的新闻供天王阅览,这样就可以做到一切了然于胸。洪秀全非常欣赏他的建议,曾作朱批“钦定此策是也”,不过并没有将这一建议付诸实施,因为他担心如果当时创办的报纸被敌人利用散布谣言,反而会成为他们对付太平天国的工具,“此策暂不可行,恐遭妖魔离间,俟杀绝残妖后未迟也。”洪仁玕曾经在上海墨海书馆学习圣经,和很多英美传教士密切交往,并曾在香港英华书院与理雅各共事从事翻译工作,受到西方文化很大影响。他创办报馆以通民情的想法很显然是从西方报馆得到的启发。这是有文字记载的中国人第一次提出创办报纸的建议,由于当时太平天国面临与清王朝对峙的严峻政治局面无暇他顾,中国报业产生的第一个机会就这样擦肩而过。

创办中国的第一份日报的使命历史地落到了王韬的肩上。在中国报刊史上,王韬被尊为“中国新闻之父”。这不仅是因为他所创立的《循环日报》是近代中国人独立创办的第一份日报,而且因为他系统阐释了新闻理论,倡导在中国发展新闻事业,对中国新闻事业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

## 二、《循环日报》:国人独立办报 发出中国声音

王韬办报的设想毫无疑问源于对于西方媒体的了解和研究。王韬曾经于1867-1869年长达两年的时间侨居英伦与汉学家理雅各合作进行中国古代典籍的翻译工作,因此对西方社会和文化有相当深入的了解。在研究西方历史和文化的过程中,他发现西方报刊媒体的舆论公开对促进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培养健康的政治生活发挥了巨大促进作用,“日报之于泰西诸国,岂泛然而已哉?所载上关政事之得失,足以验国运之兴衰;下述人心之事,亦足以察风俗之厚薄。凡山川之形盛,物产之简番,地土之腴瘠,邦国之富强,莫不一览而了然,其所以见重于朝野,良有以哉!”<sup>[2]</sup>西方国家创办报纸的情况说明日报不仅有助于当政者了解国内外形势、了解人民生活疾苦,而且开阔公民视野,帮助公众了解各国情况及形势变化,在国家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王韬敏锐地意识到,如果中国也像西方国家一样,创办报纸,让国人了解国内外的形势,可以达到上下同心、挽救国家于危难之中的目的。在旅居欧洲时,王韬还特别考察了西方国家印刷业发展的情况。他参观了爱丁堡一家印刷厂,发现印书馆“屋宇堂皇,规模宏敞……其中男女作工者,约一千五百余人,各有所司,勤于厥职。浇字、铸板、印刷、装订,无不纯以机器行事。其浇字盖用化学新法,事半功倍,一日中可

成数千百字。”<sup>[3]</sup>英国报业印刷速度惊人,已经完全实现了机械化印刷,与原来王韬佣书上海墨海书馆时用牛作动力印刷书籍相比当然更为先进。“苟中国能仿而为之,则书籍之富可甲天下。”<sup>[4]</sup>印刷工具的革新对于文化的传播具有很大促进作用,如果中国抛弃传统的手工雕版印刷,采用现代化的机械印刷工具,就能短时间内印刷刊行包括西学书籍在内的大量书籍报刊,而这正是当时的中国所迫切需要的。报纸印刷发行方便,价格低廉,可以抓住更多的读者,与翻译西学书籍相比是更为快捷、更为有效的一种传播新知识和新思想的方式。既然报纸可以起到这么大的作用,对王韬来说,创办报纸以宣传资产阶级改革、促进国内民主政治的形成与发展就成为最具诱惑力的设想。

王韬选择创办报纸作为安身立命的职业,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对印刷出版业以及报刊的编纂积累了相当的经验。在墨海书馆从事西学书籍翻译期间,他曾经负责《遐迩贯珍》(Chinese Serial)的文字校对和发送工作,初步接触到杂志的编辑工作。1864年他兼任《孖刺西报》(Hong Kong Daily Press)的中文附录《近事编录》编辑,积累了丰富的办报经验。1872年,他担任香港《华字日报》“主笔”,撰写发表了大量时事文章,对中日知识阶层产生重大影响的《普法战纪》最初就是在这里连载的。同一时期的《申报》在介绍《华字日报》时对王韬的编辑工作做出了非常高的评价:“其(注:指《华字日报》)主笔为黄平甫及王君紫诠,飞毫濡墨,挥洒淋漓,据案伸笺,风流蕴藉,盖二君留心世事,博通中外之典章,肆力陈编,宏备古今之渊鉴,政刑措置,尽托闲谈,朝野见闻,总归直笔,不第供夫乾巽志夫虞初而已也。”<sup>[5]</sup>王韬的文章立论精辟,文笔酣畅淋漓,得到了业内人士的赞许。他通过二十多年断断续续在新闻界工作的经历积累了丰富的办报经验,为独立创办报纸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873年,理雅各返回英国担任牛津大学第一任汉学教授,香港英华书院解散,王韬与英国传教士合作翻译西学书籍的生涯被迫中断,处于生活无着的状态。王韬果断决定联合该院买办黄胜(字平甫)等人集资一万墨西哥银元买下了该院的印刷设备,成立了中华印务总局,他的一些著作如《普法战纪》等就是首先在这里出版的。作为一个具有强烈经世致用思想的知识分子,王韬对治国安天下的政治理想一直念念不忘,对自己在科举考试中落第没有机会施展治国安邦之才而引以为憾。通过上书向政府当局陈述自己的见解,影响范围毕竟有限;但是如果自己创办报纸,就可以随时发表对于当前国际形势的看法,制造舆论,影响当局的决策,这成为王韬达到参与清政府改革这一目的的最佳选择。至此,王韬已经从实践、理论、物质基础乃至技术层面等方面都完成了创办报纸的准备,1874年2月4日,王韬在香港创办了《循环日报》,这是中国人独立创办的第一份中文日报,在中国新闻史及近代思想史上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

《循环日报》是一份严格意义上的日报,除星期天外坚持按日出版。《循环日报》第一版为“香港目下棉纱、花布头、杂货行情”及“各公司股份行情”,第二版为新闻版,基本的栏目有“京报全录”、“中外新闻”、“羊城新闻”三部分,第三

版和第四版为船期和广告,排版形式同《华字日报》相近。但是,它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那就是王韬经常用“弢园老民”、“天南遁叟”、“遁窟废民”、“欧西寓公”等笔名撰写政论文刊登在“中外新闻”专栏中,“该报有一特色,即冠首必有一篇论文,<sup>[6]</sup>多出自王氏手笔,取西制中适合我国者,借以讽刺清朝的改革。《弢园文录外编》即为集该报论文之精华而成。其学识之渊博,眼光之远大,一时无与甚。”<sup>[7]</sup>王韬曾经谈到,从创办报纸以来,他几乎每天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花在政论文上写作上:“自撰日报以来,境比丝纷,事同渭集,终日握管,手为之疲,几于万言倚马……虽笔墨之间,不求刻画,而才尽之叹因之。”<sup>[8]</sup>每周定期出版的报纸成为王韬的催命符,他不得不专注于写作政论以便赶上报纸的编辑印刷,有时候难免产生江郎才尽之感。

对于《循环日报》的发行王韬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探索。《循环日报》创办的第二年,他创立了每月增刊,将重要新闻和评论编辑成月报出版,单独发行,售价每月一港元,这是《循环日报》的独创。这项改革措施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成功,新闻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如果编辑重要的新闻每月出版一次,等到了读者手中,绝大部分新闻已经成了“旧闻”,读者当然没有兴趣购买,所以月报后来因为销路不畅而停刊。1878年起王韬再次对报纸进行改革,将《循环日报》改为晚报,这样就比同时期的其他报纸提前十二小时将当天的新闻提供给读者,抢占了时间的先机。作为香港出现的第一份晚报,《循环日报》大受人们欢迎。但是,由于报纸不仅在香港发行,而且大量销往大陆内地,受当时运输条件的限制晚报的编印赶不上发往广州和澳门的末班船,仍然需要等到第二天才能运走,后来他只好放弃了晚报的发行,1882年重新改为晨报。

《循环日报》的发行范围非常广泛,“省会市镇及别府州县并外国诸埠,凡我华人所驻足者,皆有专人代理”。<sup>[9]</sup>据不完全统计,广州省城有数处,沙面、河南各一处,澳门二处,国内还有佛山、东莞、虎门、厦门、福州、牛庄等处;国外有横滨、安南、星加坡(新加坡)、边能埠、旧金山、新金山、雪梨埠、庇鲁埠等处。此外,招商局还代理《循环日报》在汕头、宁波、上海、镇江、九江、汉口、烟台、天津以及日本长崎、神户的报纸发行业务。可以说,《循环日报》办得相当成功,很多文章为《申报》等国内中文报纸所转载,对读者的影响范围远远超过《循环日报》本身的发行范围。当他晚年返回上海定居时被推举为格致书院的山长(注:相当于现在的院长),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源于《申报》转载的政论文为他赢得了精通西学的美誉。

《循环日报》作为中国历史上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份报纸。它在开张布告上声明:“所有资本及局内一切事务,皆我华人操权,非别处新闻纸馆可比。”<sup>[10]</sup>报纸的“总司理”陈言(字藹廷),“正主笔”王韬,均是由中国股东共同选举产生的。其他协助办报的也都是中国人,如中国最早留美学生黄胜,留英学习法律的伍廷芳、何启,广东秀才洪士伟,担任西方资料翻译的张芝轩、胡礼垣等等。王韬对由中国人独立办报这一点非常重视,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发表独立见

解,而不是处处由西方人控制。他认为,香港、上海所创办的一些报纸,担任主笔的虽然是中国人,但是报馆是由西方人开设的,所以并没有绝对的言论自由。“主笔之士虽系华人,而开设新闻馆者仍系西士,其措词命意,未免径庭……欲矫其蔽,则莫如由我华人日报始。”<sup>[11]</sup>既然开办报纸的是西方人,报纸刊登的内容或者其思想倾向当然由他们定夺,担任主笔的华人没有决定刊登内容的自主权,因此并不能真实反映中国的情况和中国人的看法与思想。《循环日报》革了这一弊端,以中国人自己独立办报作为创办宗旨,坚持从中国人的立场看问题,发表对于当时的中外交涉事务提出的见解,发出中国人自己的声音,影响了舆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 三、新闻理念:沟通中外上下 引导正确舆论

王韬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发表文章倡导新闻理论的学者。他先后在《循环日报》“中外新闻”专栏发表《西国日报之盛》、《倡设日报小引》、《日报有裨于时政论》、《论日报渐行于中土》、《论各省会城宜设新报馆》、《论中国自设西文日报之利》、《书日本新报后》等政论,论述了办报的目的、报刊的职能和作用、报刊应该坚持的立场以及主笔的遴选原则等,全面阐发了自己的新闻理念。其中报纸的社会作用和职能是王韬关注的重点。1878年2月,他发表《论各省会城宜设新报馆》,系统论述了报纸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认为报纸可以“知地方之机宜”,“知讼狱之曲直”,“辅教化之不足”,“指陈时事无所忌讳”等。其后,在《论日报渐行中土》中,这一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他全面地分析论述报纸在西方国家所发挥的社会作用,指出清政府当局应该重视报纸的作用,创办发行报纸,让报纸成为辅助国家走向富强的有力工具。

王韬认为,报纸主要有三个基本职能与作用。第一个作用是“通中外消息”,沟通中外,让中国了解世界,并让世界了解中国。中国长期与世界隔绝导致国人对世界其它国家缺乏了解,夜郎自大,盲目轻视其它国家,在外交中处处陷入被动局面。即使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了解世界形势的必要性,人们不可能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走遍世界,在这种情况下,报纸就成为了解世界形势的有效途径,因此通过阅读报纸,国人可以了解国内外形势,改变过去闭目塞听的局面。尤其在战争中,还可以将对方的情况详细刊载在报纸上,这样就可以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王韬认为清政府应该设立“西文日报”(而不是由西方人创办西文日报),面对西方国家发行,改变在国际论坛上西方国家控制舆论的局面,在国际事务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尤其在发生中外交涉事宜的时候,西方国家从自己的利益出发,颠倒黑白,混淆视听,造成西方民众对中国的误解,令中国处于不利地位。所以,中国应该通过设立报纸,揭露事实真相,让西方民众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和中外交涉的真相,取得国际舆论的理解、同情和支持,从而在中外交涉中获得主动权。

报纸的第二个重要作用是沟通统治者与普通民众,消除隔阂,既可以做到上

情下达,又可以做到下情上达。对于实现国家民主来说,沟通直接关系到统治者能否得民心的问题,而能否得民心实则关系着清王朝统治的生死存亡。王韬将报纸被提高到关系国家命运的高度。西方国家的报纸在将国家政令传达到民间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西人凡于政事,无论巨细,悉载日报。”<sup>[12]</sup>作为借鉴,清政府当局应该在各省会都设立报馆,在报纸上刊登政令,及时把朝廷的法令政策传达给民众。另一方面,中国封建专制统治吏治腐败,政府最高统治者根本不了解人民的生存状况,因此应该在报纸上开辟“民情栏”,登载社会新闻,让统治者了解民间的真实情况,“以达民情于上”。这样就可以做到上令下达,民情上悉,使得整个国家成为一个真正的整体,在国家中外事务中采取一致的对策。

报纸的第三个作用是引导正确的舆论。报纸在西方国家的社会生活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西国最重日报,有时清议所主,足以维持大局。主笔之士,位至卿相。国家有大战事,橐笔从戎,随营记录,视其毁誉以为胜负。英美两国每日印至二十万纸,分布遐迩。”<sup>[13]</sup>尤其是英国的《泰晤士报》,几乎成为国内人人必读的报纸,起到了引导舆论、教化人心的作用。中国政府也应该鼓励创办报纸,让人民在了解国家大事的同时,形成正确的对待国家事务的态度,影响民众的看法和观念,从而发挥新闻媒体应有的作用。“若夫闾阎细事,或得诸目睹,或得诸传闻,采而录之,亦足使阅者生惩动之思。”<sup>[14]</sup>通过阅读报纸,人民可以了解是非曲直,这样就达到了扬善抑恶,“辅助教化之不足”的目的。另一方面,报纸还可以通过舆论影响政府的决策。报纸是民心的反映,国家重视民心就必须重视报纸;一个不重视报纸的社会,自然不重视民众的看法,是国家政治腐败和吏治腐朽的表现。在王韬看来,报刊的创办是和国家的兴亡联系在一起的,大量报刊的出现意味着一个事实:国家的政治生活走向自由、民主。政府应该提倡言论自由,鼓励民众言政议政,国家才会走向繁荣富强;如果政府压制民众,堵民之口甚于防川,导致老百姓噤若寒蝉,国家离覆亡之日也就为时不远了。

#### 四、循环之道:变法以自强 持论须公正

王韬的新闻理论是其自强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循环日报》命名中“循环”一词的含义,后世研究者有多种说法。戈公振认为,“‘循环’云者,意谓革命虽败,而藉是报以传播其种子,可以循环不已也。”<sup>[15]</sup>方汉奇则认为,“王韬以‘循环’名报,当然有‘循环不已’的意思,但是它所期待的那个‘终而复始’、‘若循连环而无穷’的东西,绝不是‘革命’,而只能是他心目中的亘古不变的‘三王之道’,和他所尊崇的正在东渐之中的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政治思想。”<sup>[16]</sup>从王韬在《循环日报》上发表的一系列政论文的论述可以看出,他认为中国应该通过“渐变”的方式进行社会变革,反对任何形式的革命,所以“循环”不可能是革命的意思。方汉奇也认为戈公振“循环即革命”的观点站不住脚,但据此推出“循环”就是“亘古不变的‘三王之道’”,并没有充分的证据。王韬指出,诸多论者认为中国社会发展一直处于停滞状态,这一观点是错误的,中国并

非一成不变，“上古之天下一变而为中古，中古之天下一变而为三代，……三代之天下至此而又一变”，<sup>[17]</sup>“变”是中国的常态。时至 19 世纪晚期，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正处于“天地之一大变”的紧要历史关头，“三代之法不能行于今日”，<sup>[18]</sup>王韬明确指出无论三代之法多么令人称羨都不可能当时的中国付诸实施。由此可见，王韬对当时的国际形势判断相当准确，虽然他非常推崇三代之治，但是他非常清醒，中国已经不可能回到过去，根据当时的形势进行相应的变通才是上策，“设我中国至此时而不一变，安能埒于欧洲诸大国，而与之比权量力也哉！”<sup>[19]</sup>只有与时俱进，在当时特定的形势下采取相应的对策，才能与欧洲诸国相抗衡，“变”是当时中国的唯一选择。既然中国不能再回归“三王之治”，那么应该如何“变”呢？

其实，王韬本人在文章中对《循环日报》中“循环”一词的含义反复进行阐述。“或谓有国家者，弱即强之机，强即弱之渐，此乃循环之道也。”<sup>[20]</sup>所谓的“循环之道”，就是天下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国家的强弱也是如此，虽然当时欧洲诸国纷纷强迫中国签定丧权辱国的条约，中国处于危难之中，但是中国一定会再次崛起，“吾知中国不及百年，必且尽用泰西之法而驾乎其上。”<sup>[21]</sup>就中外而言，风水轮流转，百年之后中国会超越西方国家成为世界强国；就中国国内而言，“循环”的历史规律同样发挥着作用。“时在咸丰初元，国家方讳言洋务，若于官场言及之，必以为其人非丧心病狂必不至是。以是虽有其说，而不敢质之与人。不谓不及十年，而其局大变也。今则几于人人皆知洋务矣。凡属洋务人员，例可获优缺，擢高官；而每为上游所器重，侧席咨求；其在同僚中，亦以识洋务为荣……噫嘻！是何一变至是也。是岂天道循环，人事变迁，应出于是哉！”<sup>[22]</sup>中国由一个闭关自守的封建国家，“一变”而成为人人谈洋务、人人谈变法的局面，这个巨大的变化恰恰体现了天道循环的规律。王韬的循环论和其变法自强思想是辩证统一的，中国必须通过自强，才能达到富强的目的，这是其循环史观的最主要的内容。王韬的循环史观，是包含着变化的循环，是一种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肯定了中国社会改革的合理性，具有历史进化的合理内核。其实，他所说的“循环”已经远远超越了“周而复始”的含义，是否定之否定，但是由于当时尚未产生新的词汇来表达这一思想观念，“循环”一词实际上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对王韬变法自强思想的不甚恰当地表达和概括。王韬之所以将自己创办的报纸名为“循环日报”，很显然是希望以这份报纸推进中国由弱变强、成为堪与西方国家比肩而立的富强的新中国。

既然报纸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如此重要，对新闻从业人员就要提出更高要求，其必须做到立论公正，以揭示事情的真相为己任，避免以自己的好恶进行价值判断。“西国之为日报主笔者，必精其选，非绝伦超群者，不得预其列。……其立论一秉公平，其居心务期诚正。”<sup>[23]</sup>当时报纸的主要负责人称为“主笔”，此词内涵非常丰富，就负责整个报纸文章的编定来说，与主编的意思相近；但还包含另一层意思，即报纸的主要撰稿人，类似于专栏作家，这层意思是目前广泛使



用的“主编”这个词所包含不了的。“主笔”这个词现在没有恰当的词语可以代替,故为了尊重作者的原意起见,在本文保留“主笔”一说。主笔在报刊舆论导向上起决定性作用,其人除了富有才华,持论公正无私,不以个人的恩怨影响其观点的公正性,因为他的言论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公众的看法。媒体工作者将事情的真相及其代表的意义,透过报导呈现于大众媒体之上,协助媒体达成守望、教育、讨论等功能,依然是如今新闻从业者的基本职责,记者因此获得了“无冕之王”的称号,这与王韬对于“主笔”职业操守的界定无疑是一脉相承的。

王韬作为我国新闻史上的开山人物,在创办《循环日报》的实践中总结出自己的报刊功能理论,创立了舆论意识十分强烈的新闻理论。不惟如此,他还利用一切机会为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大声疾呼,不遗余力推动近代中国新闻事业的产生和发展,对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 注释:

[1]洪仁玕所提出的建立报馆的建议具体内容如下:“设新闻馆以收民心公议,及各省郡县货价低昂,事势常变。上览之可以资治术,士览之可以识贯通,商农览之得以通有无,服法律,别善恶,教忠孝,皆借以行其教也。教行则法著,法著则知恩,于以民相劝戒,才德日生,风俗日厚矣。一兴各省新闻官,其官有职无权,性品诚实不阿者,官职不受众官节制,亦不节制众官,即赏罚亦不准众官褒贬,专收十八省及万方新闻篇有招牌图记者,以资圣鉴,则奸者股慄存诚,忠者清心可表,于是一念之善,一念之恶,难逃人心公议矣。人岂有不善,世岂有不平哉。”《资政新篇》现收藏在英国牛津大学博物馆,由许地山先生传抄。转引自谢无量先生的论文《王韬——清末变法论之首创者及中国报道文学之先驱者》,《教学与研究》1985年第3期。

[2]王韬:《重订法国志略》(卷二一),光绪庚寅(1873)仲春淞隐庐刊。

[3][4]王韬:《漫游随录》(卷三)，“走向世界丛书”第十九种《漫游随录·扶桑游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27页。

[5]《本馆自述》，《申报》1872年5月8日。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68页。

[6]其实王韬所发表的政论文一般刊登在《循环日报》第三版的中部或左侧，刊登在最上部的是“京报全录”。估计戈公振先生并没有看到《循环日报》，他根据现在报纸的一般把社论放在第一版上部的排版格式推断王韬的政论也刊登在报纸的上部。

[7][15]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北京：三联书店，1986年，第154、119页。

[8]王韬：《弢园尺牍》（卷十），汪北平、刘林编校，“上郑玉轩观察”，北京：中华书局铅印竖排本，1959年。

[9][10]《本局布告》，《循环日报》同治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11]《倡设日报小引》，《循环日报》同治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12]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二），“洋务下”，北京：中华书局竖排标点本，1959年。

[13]王韬：《弢园尺牍》（卷九），“代上黎召民观察”。

[14]《日报有裨于时政论》，《循环日报》同治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16]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8页。

[17][19]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变法中”。

[18][21]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变法上”。

[20][23]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七），“强弱论”、“论日报渐行于中土”。

[22]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二），“洋务上”。

[责任编辑：黎虹]